

“文学文本分析”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性

刘俐俐

摘要:“文学文本分析”是处于“中间态”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形态以细致阅读为前提,辩证理解和灵活运用既有术语范畴、分析标准以及各种方法,力求以理性形式呈现作品的特质,其过程中自然蕴含着价值判断。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体系具有兼容和解决文本分析诸多问题的机制,文学文本分析的最终理论形态属于文学批评方法论,文学文本分析能够激发、丰富和创新文学批评的理论知识与原则。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加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与相关理论探索,文学文本分析作为独立的批评方法在理论上具有建设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文学文本分析;文学批评方法论;“中间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25)01-0125-09

一个概念存在时间越久,吸纳更多特质及相关元素的可能性就越大,准确概括和表述其功能就会越加困难。最早由法国批评家法朗士提出的“文学批评”概念就是如此。文学批评又常被称为文学评论、文艺批评等。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文学批评”演变为连续性和覆盖性很强的概念。赵元任于191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提出了连续性观念。他指出,任何概念在延展中都逐步融进许多差异性因素而且以“中间态”存在,并对应性地提出发现、提取并认识“中间态”思维及研究方式。^①本文借助连续性观念及其思维方式,将“文学文本分析”作为“中间态”从批评实践中提取出来,旨在发现、分析和探求其独特品质及功能,阐发其作为独立的批评类型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一、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及其范式

雷达、李建军主编的《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是近二十多年来被广为阅读和引述的文学

作者简介: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① 参见赵元任:《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石锋、潘韦功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

批评选集,该书在“文学评论”概念下容纳了多种文学研究的著述形态。第一类是对宏观文学观念的倡导及阐发,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第二类是借助对具体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分析,讨论文学艺术的各种问题或者原理,如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钱锺书的《通感》、朱光潜的《看戏与演戏》、傅庚生的《悲喜与同情》等,此类著述实具有文艺理论性质。第三类是在文学史及艺术史脉络中探讨文体、审美取向以及创作趋势问题,多数篇什有细致分析,如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钱穆的《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王蒙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第四类是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以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俞平伯的《〈红楼梦〉的风格》、李长之的《评老舍的〈离婚〉》、马茂元的《论〈戏为六绝句〉》、陈寅恪的《读〈哀江南赋〉》等为代表;另一种以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等为代表。前一种分析特性突出,数量占比明显大于后一种;后一种不以分析为基本方式,评论特性突出。总的来看,针对《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编者指出:“这本书的总格局明显地头重脚轻,即现代部分重,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分量轻,也同样不是人为的结果。”^①从选目及其分类比重看,编者在无意识中认可与重视文学评论中的细致分析及其学理追求,但尚未明确指出文本分析与评论的区别,由此文学批评连续性中文本分析这种“中间态”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中存在着“文学文本分析潜流”,其注重文本细读,追求学理和分析旨趣,主要包含在具体作家作品批评类文章中。代表性的文章有陈寅恪的《读〈哀江南赋〉》、吴宓的《〈红楼梦〉新谈》、茅盾的《读〈呐喊〉》、俞平伯的《〈红楼梦〉的风格》、李健吾的《〈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李长之的《评老舍的〈离婚〉》、缪钺的《论李义山诗》、马茂元的《论〈戏为六绝句〉》等。翻检相关文献得知,这股潜流大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终于50年代末,多种因素促成其发生:批评家少年时代即追求科学及其原理的理念,如李长之;以“中庸”为指导吸纳西方之长以补中国之短的“会通”一派及其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如吴宓就是西方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追随者,并坚奉“会通”理念,陈寅恪则智慧地采取“避其名而居其实”的会通策略;瑞恰慈从1939年始在清华大学系统介绍英美新批评理念,极力倡导文本细读方法。下面笔者就以李长之、吴宓和俞平伯的三篇分析性言说文章为实例来进一步阐发。

李长之《评老舍的〈离婚〉》一文的分析理路有三。其一,文章辨析幽默和讽刺两者之区别,以此为“论老舍的幽默”的立足点:“与其说老舍的小说是以幽默见长,不如说是讽刺。更恰当地说,他的幽默是太形式的,太字面的,不过作为讽刺用的一种表现方法。”^②这是李长之基于对老舍性格和内心世界的把握来立论的。在李长之看来,老舍平和温良的性格,导致他不敢对现实抱有不切实际的梦。但他具备不断迸发的丰盈且多方面的思想和观念,所以大体上他是成功的。李长之的意思是,幽默需要特定的能力。其二,文章客观地指出了小说文本中“那不经意的错失”:老舍太喜欢用堂而皇之的字样了,致使讽刺太过而失味,有些地方画蛇添足,反而把趣味降低了,等等。这些客观分析彰显了幽默的艺术特性。其三,文章的艺术分析指向了老舍幽默的目标:他最常讽刺的是敷衍,妥协,是小说中人物怯懦的性格。

①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编选说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②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编选说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怯懦导致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走极端,总是折中。由此小说逐步引向了对于意义的探寻。其四,文章分析确有归结,即作品题目之内涵:“‘离婚’究竟是在敷衍,妥协,怯懦的空气下,一个复杂相的一点消息而已。‘婚’并不曾怎么大‘离’。”^①

《〈红楼梦〉新谈》源自吴宓在哈佛大学进行比较文学系统研修期间所做的讲演,后发表于《民心周报》1920年第17、18期,被学界看作以西方文学视角重新阐释中国文化的力作。吴宓独特的分析理路为:坚持批评以文体为基础,由此选取了美国哈佛大学英文教员 Dr.G.H.Magnadier(麦戈迪纳尔)的标准,吴宓信服其“谓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的说法。“六长”指宗旨正大(serious purpose)、范围宽广(large scope)、结构谨严(firm plot)、事实繁多(plenty of action)、情景逼真(reality of scenes)、人物生动(liveliness of characters)等。随后吴宓用“六长”标准对《红楼梦》进行细致分析和品评,而且将各条标准相互关联和贯通。仅以“宗旨正大”的释义及分析来看,他设计了周延的图示以清晰界定“宗旨正大”;分别以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刘姥姥四人为线索设计了三个维度:社会历史大道理、聚焦人物的具体道理、凝聚大道理和具体道理的小说人物,由此人物彰显之道理的内在逻辑清晰。比如,他分析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时,聚焦于人物的具体道理,分别为“教育之要(外)”和“以理制欲(内)”;社会历史的大道理则为“个人本身之得失”。按此路数文章随后依次分析了林黛玉、王熙凤和刘姥姥三个人物形象,体现了“《石头记》固系写情小说,然所写者,实不止男女之情。间尝寻绎《石头记》之宗旨,由小及大,约有四层,每层中各有郑重申明之义,而可以书中之一人显示之”,即“天理人情中根本之理”。^②由此可看出,吴宓将“大处落墨”理解为创作理念和通观阅读效果之合一。

俞平伯的《〈红楼梦〉的风格》亦有其分析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开阔的文学视野让他敢于提出新说,如“《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类文学的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的身世性格的反映。……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③其二,新说倚赖细致分析的支持。他认为,曹雪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引出了《红楼梦》两个特色:逼近真情与一洗前人大团圆窠臼,因此这是一出悲剧、一部问题小说,“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④。其三,分析依据知识而展开。他说《红楼梦》作者的唯一手段是写生,由此辨析写实和虚构之区别。他认为,人们一般认为写实容易虚构难,其实,“虚构很容易,也并不可贵,写实貌易而实难,有较高的价值”^⑤。曹雪芹的天分恰恰体现在写实上。此外,他概括了阅读规律:“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⑥其四,采用了两种比较方法,使分析更加有理有据。一是比较不同类型,借助比较发现《红楼梦》怨而不怒。《水浒传》《儒林外史》固然也不错,但《水浒传》是一部怒书,与之相比,《儒林外史》虽愤激之情稍减,但牢骚却有过之。二是比较同类之高下:“《儒林外史》与《广陵潮》是一派的小说。《儒林外史》未始不骂,骂得

①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6~265页。

②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编选说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2~84页。

③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④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⑤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⑥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2~163页。

亦未始不凶,但究竟有多少含蓄的地方,有多少穿插反映的文字,所以能不失文学的价值。《广陵潮》则几乎无人不骂,无处不骂,且无人无处不骂得淋漓尽致一泄无余,可以喷饭,可以下酒,可以消闲,却不可以当他文学来欣赏。”^①

以上三篇文章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确曾有过具有文学文本分析特性的批评。这种批评以细致阅读为前提,运用可信赖的批评标准和各种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既有术语被辩证理解和灵活转换而形成的方法,力求以理性形态说清楚作品的特质,分析过程中自然蕴含着价值判断。

二、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及其理念

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有其特定的发生语境,如广泛汲取了现代学者的文艺批评经验;深入学习和借鉴20世纪译介到中国的现象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等外国文学理论,“细读”被广泛认可、追求和践行;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意识日益自觉等。

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分析以文学文本为对象,名称与实践兼有“文学文本解读”和“文本分析”两种,“解读”和“分析”实践体现了理论诉求的宗旨,实践与命名相符。当然也有实践和命名不相符合的情形,如陈国学、周雪根合著的《以文本分析为中心的明清小说研究》,讲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方法、成书过程、思想文化内涵和主题、人物形象等,以此区别于版本、作者等问题的研究,但这类著作并非实际的文本分析类著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有一类文章虽以文学文本为对象、以细致阅读为前提,去辩证地理解和灵活运用文学内外既有术语范畴以及各种方法,但呈现的却是针对文学之外其他领域某些理论和实践中重要问题的思考结果,概言之,引发批评的问题以及分析结果均溢出文学。^②

在以文学为中心的文本分析实践及其理论探讨中,文学文本观念有其形成原因和独特构成。重要原因之一是“新批评”理论关照下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或者“本体论的地位”的思想影响,唤起了中国学者探寻文学本体的自觉意识。今人将《文心雕龙·知音》中“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的观念与西方的层次性思想相结合,产生了从多维度、多层面理解文学文本的思维方式。中国学者自觉地区分了“作品”与“文本”,澄清文本是指未被任何一种审美阅读所具体化了的语言形态,文本分析侧重语言形态本身,注意到了“文本”耐受分析研究的特性。代表性成果有孙绍振的“文本三层次”说,孙绍振指出,建构文本解读学的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文学文本是一种立体结构,至少应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亦即表层的意象群落(五官可感的行为过程,心理活动和语言的逻辑连续性等),它是显性的,人的情感价值渗透其中并将之同化,就形成了审美意象。意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群落的有机组合,其间有隐约相连的情志脉络,这是文本的第二个层次,可以叫作意脉(或者叫作情志脉)。其特点为:第一,以潜在的情志同化表层的意象;第二,使表层的意象群落在形态和性质上和谐贯通;第三,贯通意脉所遵循

^①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编选说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② 此类文章参见朱国华:《另类的思想实验:重读〈伤逝〉》,《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何怀宏:《浪漫的善——雨果〈悲惨世界〉中的理想》,《小说评论》2024年第3期。

的逻辑,不是实用理性逻辑,而是超越实用理性的情感逻辑;第四,具体作品中,不管是小型的绝句,还是大型的长篇,情感的脉络都以“变”和“动”为特点。^①另有学者在“对中外相关理论梳理和对比中,发现中外文论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文学文本存在方式,或者从‘层次’或者从‘面面观’的角度相应得出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多侧面构成的看法”,进而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本体是建构性和开放性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前提。……确认多层次立体结构的文本存在方式,意味着拓宽了文学批评方法可以介入的空间,为多种方法在文学作品的各层次间进行对话和交往,形成批评话语的间性创造了条件”。^②这突显了将文本如何存在与文本分析路径关联思考的特点。

在以文学为中心的文本分析实践及相关探讨中,文学文本解读和分析大多有相对明确的目的。孙绍振的理论探索和解读实践亦如此。其解读实践锁定古今中外经典性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如《经典小说解读》《孙绍振古典散文解读全编》等。《文学文本解读学》是他系统阐述解读理论及方法的著作,该书介绍的解读方法以感性体悟为基本方式:强调读者与作家潜在的情感交流,强调“艺术感知的还原”、“情致的瞬间转换”以及“隐性情感的动态起伏”等,所以均以作品个案解读方式切入。毋庸置疑,孙绍振的解读水平较高进而成为一种示范,他的解读主要诉诸欣赏、感悟和模仿等方式,不以系统严谨的理论形态呈现。孙绍振自己并未概括和表述他的解读目的,依据文学价值论,阐释活动均具有价值属性,关键是阐释旨趣何在。孙绍振的阐释旨趣在于引导读者审美感受的释放,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具有社会审美培育功能,这是值得尊重和认可的。

揭示文学文本内在艺术价值形成机制,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文本分析目的。文本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活动,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寻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这种文学研究活动强调自觉方法意识,采取与文本相应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学理性分析,在分析中自然地转换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从研究者主体角度来看,其目的与文学鉴赏迥然有别。如果说文学鉴赏的目的是阅读者自己获得愉悦体验,那么文本分析的目的则是探索研究文本的艺术价值。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这种文学研究方式是以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为基本前提的,也就是说,当文本分析工作开始的时候,已经默认这个作品是值得分析的。从工具角度来看,由于文本分析是一种充满理性的、对应着具体文学作品的、具有明确目的的研究活动,所以,工具即方法作为中介贯穿在研究者主体和客体之间。^③其中两个元素值得讨论。一个是既然“以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为基本前提”,那么正视艺术效果自然有以细读为基础的审美感受感悟,但绝非止于审美感受,而是要通过分析力求说清楚审美感受产生的原因。另一个是“在分析中自然地转换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分析与评价是相互区别的两种行为,分析得出的是价值构成之事实即真相,为审美评价打下基础;评价则侧重价值判断。此说与孙绍振的价值取向虽有区别,但两者最终都指向价值领域。分析的目的是探究和说清楚审美感受发生的原因,与孙绍振所说的“有效的文学文本解读,就是探究到了艺术的奥秘”的涵义相近。可以推断,孙绍振以感悟为渠道的解读实践和理论诉求,对于被带领者而言,其功能在于让他们被感染并进入审美鉴赏能力得以培育及提高

① 参见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黄山书社,2019年,第29~31页。

② 刘俐俐:《一个有价值的逻辑起点——文学文本多层次结构问题》,《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③ 参见刘俐俐:《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路径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的过程;对于学术领域而言,其功能是逐步形成系统的文学解读的美感培育方法论。“文本分析”提出者以分析为基本特质,以文本新发现新思考激活和丰富文学艺术特性理论,逐步形成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

基于某种学术目标和问题的文学文本分析有其特殊的发生背景、理路和风貌。哲学领域的价值论在相关的人文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价值论的“关系说”“实践说”两条基本规定性,鼓励学者打破学科限定,选取研究对象,如伦理学领域的学者,频频从文学作品中发现与社会现状及发展趋势关系密切且能体现其兴趣所在的伦理问题,跨学科地提问题为既有传统。何怀宏的《浪漫的善——雨果〈悲惨世界〉中的理想》可为代表。何怀宏依赖细读文本和自身体悟提出,《悲惨世界》是一部浪漫的劝善书,突出特征是在极端对立中展现善恶并且虔诚进步,雨果总把过去视作黑暗与罪恶,提出未来的天堂想象。何怀宏指出,雨果的人道呼吁无比感人,他的作品永垂不朽。但雨果的这些善意如何实现,比较浪漫地实现还是比较切实地实现?比较切实地实现显然是何怀宏思考的重点,即“具体政治方案”是最根本的,就此他提出了思考的线索:良法与恶法何以区分,法律建设如何防止来自权力、金钱和私人关系等因素干预,普通人怎样保持正直并防止大奸大恶,伦理建设如何应对人性中与禽兽类似的部分等。依托对《悲惨世界》的分析,他警觉地提出:“浪漫在个人的生活和个人的情感中,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如果用于社会和政治的领域,乃至提出具体的方案,也可能隐含着巨大的危险。”^①在此,或可这样概括何怀宏的文学文本分析:其分析对象为文学经典,并以理性细致的分析为展开方式。至于朱国华的《另类的思想实验:重读〈伤逝〉》^②,则启发我们从“思想实验”的维度来明确标识这一类文章。何怀宏和朱国华的文本分析,均以令人瞩目的文学经典为分析对象,在重读中提出新问题,激发新思考。何怀宏意识到以浪漫为艺术追求的文学创作确实为文学史事实,却细心地察觉到浪漫主义掩盖下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何怀宏认为,雨果写彻头彻尾的恶人德纳时心里是有疑问的——是否有些人的恶性终究无法改变?难道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原始的火星”让人改恶从善吗?为了“思想实验”,何怀宏依据文学作品的人物性格、情节和细节等展开分析,发现了文本与现实法律和伦理的若干冲突之处,更将视野扩展到雨果的《九三年》以及与雨果同时代或者距离较近的有关雨果作品和为人的一些评论,如拉马丁的《对一部杰作的考察,或天才的危险》、莫洛亚的《雨果传》等。朱国华、何怀宏这类具有“思想实验”属性且借助文本分析开展的研究,对于文学史、文学思潮及流派、文学基本理论乃至作家等所具有的反思、突破和创新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及初步理论探索中,“文学文本”和“分析”覆盖了既有文本分析的全部实践,初步的理论探索分布于针对文本观念、文本分析功能以及分析方法论等关键问题的探讨当中。在功能方面,有实践功能和理论研究价值功能的区分,由此解读/分析主体意识得以彰显,这综合地显示出文学文本分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理论建设凸显自觉或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区别仅在于功能指向和学术目标相异导致的方法论朝向不同。

① 何怀宏:《浪漫的善——雨果〈悲惨世界〉中的理想》,《小说评论》2024年第3期。

② 朱国华:《另类的思想实验:重读〈伤逝〉》,《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三、作为独立批评形态的文学文本分析之可能性与合理性

既有实践和初步理论探索呈现了文本分析广阔的问题域。主要的问题有文本分析属性及其在文学批评中所处的位置、文本分析和其他类型批评的关系、文本分析的功能、文本解读/分析的受益和行为主体各自的意义、文本分析该有怎样的文本观念等。以上问题相互牵制,哪个问题能够兼容其他问题得以展开并得到解决呢?本文尝试性提出,以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为基本平台和主要建设目标即为关键问题。基本平台,是指以上诸问题可以在方法论体系内被兼容和解决;主要建设目标,是指方法论为文学文本分析最终的理论形态,即最终的理论本体。概言之,解决问题平台与理论本体两者融为一体。

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有其理论特质。首先,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以价值为轴心兼容主体与客体。哲学层面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方法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工具,它通过两极否定作为中介,一是否定表现在目的里的直接的主观性;一是否定表现在方法里的直接的客观性”^①。该原理辩证兼容主体与客体,在相互关系范畴中使主客体都得以实现。我国现代与当代的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均聚焦于文学经典作品。李长之、俞平伯、吴宓等现代批评家如此,当代如孙绍振、笔者以及“思想实验”类批评家等亦然。文本分析主体的自觉选择意识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理解了文学经典的人文价值与艺术特质,二是立足主体并抵达了客体。概言之,文本分析含有融通主客体双方的属性,以此使主体着手辩证理解和解决文本分析的主客体关系,从而确定方法论建设的可行性。文艺学理论的发展也提供了相应的思想成果。围绕批评家主体能力问题,谭好哲的《感受力、阐释力、判断力——论文艺批评的主体能力》一文,立意在于阐述批评家能力,于容纳批评家和文学接受者双方的思路中,清晰阐发了批评家的感受、分析和评价等三种能力。根据前文叙述,我们已知既有解读/分析实践触及了解读/分析者和接受者两类主体,但两类主体各有怎样的价值旨趣,此前研究关注不多。从既有解读/分析者的主体价值旨趣及其差异来看,似可做如下概括。孙绍振意在以文学经典解读感染解读者,提高大众审美感受力,价值旨趣在于普遍的社会审美培育。笔者的文本分析实践意在发现、揭示乃至说清楚文学本体特性及艺术价值形成机制,价值旨趣在于促进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思想实验”类批评家的价值旨趣则更复杂。解读/分析主体和一般接受主体两者的功能即价值目标也没有得到清晰定义及阐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个现象值得注意,近40余年我国文论脉络中的文学活动论,其接受环节的理论已经明晰:一般读者的欣赏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评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审美则是他们的共同旨趣。沿着这个思想成果,两种审美感受被分配到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两个研究分支去研究了,方法论视阈中两种审美感受力的异同问题却被忽略了。王一川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将一般读者和批评家均称为“读者”的前提下,指出一般读者重理解和体验,批评家重评论。在他看来,理解和体验是评论之前的必需作为,批评家在阅读和批评中体现特定的批评方式且能够反思。^②他所提到的“批评方式”值得我们注意,为方法论建设平台上解读/分析主体和一般接受主体两者的区分以及各自的功能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① 陈鸣树:《文艺学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30页。

② 参见王一川:《文学批评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22页。

根据方法论中“否定表现在目的里的直接的主观性”^①的原理,怎样从主体价值取向出发对应性地触及和规范作为客体的文学文本是重要问题。西方文论史已显示了此难题:20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本体论沿着从文本中心向读者中心转移的路向发展,强调读者的参与对作品的生成功能,如此出现了“作品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现象。如何避免这个吊诡现象?我国的文本分析实践提供了主体价值取向与作品客体属性相对应的几方面经验。其一,以作品涵括的基本的人文意义约束解读/分析主体,强调二者的对接和吻合。其二,绝不孤立思索和规定文学本体论,而是始终将本体论和主体放在同一框架中思考。典型的理论成果便是孙绍振所提出的文学文本结构层次论。他认为“意脉”为主体之意脉,而且意脉展开又受规范形式约束,规范形式的把握则必须返回文学史和社会文化语境,沉潜着辩证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意识。其三,我国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者,在对文学价值观念、文学功能论和文学批评标准论等予以实然性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然性的文学价值观念假说。此假说重要思想成果之一是确定了“批评家的位置”,即“批评家的中介位置是指批评家位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内外的关联位置。对内要求尊重审美规律和各部分和谐统一机制,对外要求关注社会环境变化中的审美现象及其文艺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坐标,担负国家和民族赋予的重大责任”^②。如此定义的批评家位置,给予了以文本分析主体价值旨趣为中轴的主客体关联以合理性,而且符合我国历史文化语境。

其次,方法论建设能够汇合此前积累的文学文本分析实践问题,并具有将其转换为重要文学问题的可能性。这种汇合与转换是在各领域已有研究基础上采取的一种综合性方法。用来汇合的问题以有价值为原则而不受大小限定,只要与未来的综合性问题具有内在关联并且可融为一体即可。我国既有文学文本分析实践丰厚扎实,呈现和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可作为方法论平台设计问题和范畴的资源。举例来说,对于老舍的《离婚》,李长之借助情节和人物性格分析,揭示文本中确有幽默与讽刺成分,而且得出结论:作品以讽刺为目标,幽默是实现讽刺的手段,最后落脚在讽刺。如果说李长之的分析及其结论站得住脚,那么其对“幽默”与“讽刺”两个术语间关系的论述是仅适用于《离婚》,还是具有普遍性?这类现象汇合成对应性文学术语关系,是否有望转换为方法论平台的理论问题,并被设计为文本分析的普适性方法?根据经验,我们以往在鉴赏分析中常遭遇“难以解读的符号”,浅白地说,就是文本审美鉴赏确实发生了,却无法准确描述审美鉴赏的感受情形,更无法运用现成的批评方法或术语说清楚审美机制如何发生。对此,既有研究已经认识到理论有效的相对性以及无效的绝对性,进行了探索,并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即针对文本情节、主要人物关系以及最终结局,放弃运用既有方法的努力,转而自行设计对应文本特点的方法,实现了自如分析,而且说清楚了艺术魅力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类成功经验汇合归纳,可否在方法论平台转换为“‘难以解读的符号’种类及其分析方法设计的逻辑与范畴”等类似的问题线索,值得探索和尝试。再则,为了特定艺术效应创造性地糅进各种元素,比如将民间故事类型融入文本,使人物塑造、情节乃至细节产生特异艺术效果。已有的一些分析经验不受既有文学理论和作家文学批评视阈的限制,大胆地从民俗学及民间故事领域汲取资源,采用各种资源融合

①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91页。

② 刘俐俐等:《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334页。

的分析理路及方法,在古代文本和现代文本分析时都有过较为成功的探索。^①由此可考虑设计“特异文本现象的跨学科分析理论及范畴”等。仅从叙事性文学文本分析范围来说,针对文本中常有的叙事学术语的特异性表现等,既有分析曾经结合探寻人文意义,变通性地给予有效解释。如此,我们可以尝试将相关实践汇合后转换为“既有文学学术语转换变异”等问题线索,汇合转换来自实践,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但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可以对之予以规范和拘束,使之更具科学性。

再次,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建设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重要平台。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建设是创新性理论工作,遵循一般方法论和艺术学的特殊方法论。艺术学内部具体方法中多层次的原理显然很重要。对于“一般方法论”,学界表述虽存在差异,却已达共识:一般方法论即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它给予中间层和最底层方法以灵魂和思维规定。灵魂和思维规定给予辩证性、机动性地理解艺术学方法以合理性。文本分析要处理的解读/分析主体和对象性客体的界定、分析具有哪些功能等问题,可以由此获得既灵活又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未来方法论范式创新和若干命题的提出等因之有了原理支撑。阐述至此,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的意义已经显现,即能够激发和促进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理论的批评化之路……这就要求理论能够对具体的文学文化现象/文本/活动展开有效批评,并在此过程中发现真知,建构理论”^②。文本分析实践体现了对于既有文学学术语和文学作品定论的质疑和反思,它以说理为基础,注重详细阐发,这些特点使得文学文本分析建设有望极大促进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通过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分析实践和相关理论探索,我们能够发现文学文本分析作为独立批评形态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基于其可能性和合理性,当前更为必要和重要的任务是探索文学文本分析方法论的系统建构,此建构既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又是其关键。这项工作需要多方参与和扎实推进,譬如对于相关概念的澄清、对于相关实践的深入解读和方法归纳、分析范式之理论探索等等。

责任编辑:李彦姝

^① 详见刘俐俐:《今天怎样阅读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催粮差〉的文本分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刘俐俐:《从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系列故事叙事看其介于口头艺术和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性——以凌濛初的〈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为例》,《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2期。

^② 肖明华:《当代文学理论知识学反思与重构的三种形态——以陶东风、李春青、陈晓明为个案的考察》,《文艺论坛》2019年第2期。

Remolding Glory: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Disabled Soldiers in the Shandong Liberated Area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Li Hongtao, Li Xiang

Abstract: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disabled soldiers is a key aspect of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employment, and survival.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Shandong Liberated Areas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governing management, teaching institutions, education programs, and cadre development,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systematic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se efforts focused on harnessing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disabled soldiers, with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supplemented by vocational and production training.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arious parties, this education improved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levels of disabled soldiers, helped them settle down, support production, contribute to the regime's construction, and ultimately "remold" their glory.

Keywords: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Shandong Liberated Areas; disabled soldiers;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Proposition of "Literary Text Analysis" and Its Possibility

Liu Lili

Abstract: "Literary Text Analysis" is an "in-between" form of literary criticism, grounded in careful reading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erminologies, standards, and methods. It aims to present a work'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a rational form, often involving value judgments. The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criticism provides mechanisms to address various issues in text analysis. As part of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ology, literary text analysis has the potential to enrich and innovate literary theory. By analyzing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texts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e and feasibility of literary text analysis as an independent critical method can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literary text analysis;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between" criticism

The Literary Experience of New Vocabulary In Revolution: Taking *FanShen* (翻身) as an Example

Zhou Weidong

Abstract: New vocabulary in revolution represents a fundamental ele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 self-expression system. By examining its connotation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we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reteness and richness of the revolution. Using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experience of *FanShen* as an example, its depiction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has evolved through three stages, highlighting specific issues and universal experiences in revolutionary expression. In analyzing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experience of *FanShen*,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odern and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s it encapsulates.

Keywords: new vocabulary in revolution; *FanShen*; literary experience

"Transla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Yan'an Literary Activities

Luo Wenjun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ranslation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in Yan'an's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due to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ission of the time. It fostered a political, revolutionary and organizational concept of translation. Viewed as a means to engage with the global situation and connect with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Alliance, translation provided Yan'an literature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a connective function. It also served as a tool for studying Marxist-Leninist theory, strengthening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practices brought diverse literary elements into Yan'an literature, highlighting individual effor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political ideology, translators' aspirations and translation concepts formed connections and resonated throughout Yan'an literary activities.

Keywords: Yan'an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conception